

南朝“东境”的自然灾害与麦作

占磊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要】南朝时期“东境”与“东土”和“东诸郡”所指范围相同,包括吴、吴兴、义兴和南徐州部分地区及以会稽为首的浙东诸郡。“东境”频繁的自然灾害冲击了传统的水稻种植业,造成大量流民,也破坏了都城的经济基础。南朝政府施行开仓赈济、跨区调粮、开漕泄水和推广麦作等政策以应对“东境”灾荒,渐意识到在“东境”等地督种麦是调和折中后具有长期和多方面效益的、可实行的方案。这不仅能接续受破坏的粮食生产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救荒的作用,更可保障由“东境”、建康和缘淮地区共同构成的东部粮食供给系统的运转。另外,考察南朝政府灾荒观念之演变也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在“东境”推广麦作的原因和深层意义。

【关键词】东境;灾害;麦作;粮食供给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3)04-0072-10

Natural Disasters and Wheat's Expansion in the East Area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ZHAN Lei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The East Area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included Wu Jun, Wuxing Jun, Yixing Jun of Yangzhou, Jinling Jun of Southern Xuzhou, and prefectures at the east of Qiantang River. Natural disasters happened frequently in the East Area, which ruined local rice productions, created innumerable refugees, thus destroye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capital. In order to relieve disasters and famines of the East Area, the governments opened granaries, transported grain from other areas, implemented som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urged people to plant wheat in the East Area, and finally they realized the superiority of wheat cultivation in relieving disasters and protecting the food supply system of the east region that was composed of the East Area, Jiankang City and the area along the Huai River. Furthermore, analyzing the change of attitude towards disasters and famines of the governments is helpful in understanding the reason of cultivating wheat in the East Area.

Key words: the East Area; natural disasters; wheat; food supply system

南方麦作的展开是中国农业史和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南朝则是江南麦作推广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时间段。以往的研究从移民、气候、地貌和政府政策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南朝江南的麦作。

江南麦作的开始时间约在吴末西晋时期,永嘉南渡后麦作在江南得到进一步发展^①。关于东晋南朝

[收稿日期] 2022-04-04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华治水历史脉络梳理与国家文化形象构建研究”(22JZD039)

[作者简介] 占磊(1994-),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

① 张学锋:《试论六朝江南之麦作业》,《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

时期麦作在南方得以推广的原因,首先,黎虎、张学锋、何德章和韩茂莉等学者都指出了北方人口南迁这个要素,且韩茂莉认为梁陈时期多数北方移民完成土著化,导致萧齐以后南方政权以官方指令形式倡导北方移民种植小麦等旱地作物的现象基本不再出现^①。韩教授所关注的移民土著化与南方麦作减少之关系的确值得注意,不过《陈书·世祖纪》载:“朕哀矜黔庶,念康弊俗,思俾阻饥,方存富教。麦之为用,要切斯甚,今九秋在节,万实可收,其班宣远近,并令播种”^②,可见萧齐以后南朝政府仍然重视麦作,并令百姓播种。其次,黎虎和王勇还提到气候变化对推广麦作的积极意义,即东晋南朝气候转寒,为耐寒耐旱的麦类南移提供了有利条件^③。另外,诸多学者都强调了东晋南朝政府督民种麦对麦作在江南的推广所具有的促进作用。与此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政府在江南推广麦作的原因。黎虎认为“每当饥荒发生之时,粟麦等旱田农作物的优越性愈益明显,政府尤大力督种,以克服灾荒”^④。何德章持论与黎先生相同:“东晋南朝政府在属于江南地区的南徐、扬州、浙江西属郡或‘东境郡’推行麦作,并非因为旱作比稻谷省功且收效大,具有明显的优势,而是应对旱灾采取的特殊救荒措施”,并将这种救荒作用视为旱作在南方推广的三个原因之一^⑤。

学者们认为救荒是南朝官方推广麦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此观点主要受《宋书·文帝纪》和《宋书·孝武帝纪》所载两道“种麦诏”之影响。《文帝纪》载元嘉二十一年(444)七月乙巳诏曰:“比年谷稼伤损,淫亢成灾,亦由播殖之宜,尚有未尽。南徐、兖、豫及扬州、浙江西属郡,自今悉督种麦,以助阙乏”^⑥。《孝武帝纪》载大明七年(463)九月己卯诏:“近炎精亢序,苗稼多伤。今二麦未晚,甘泽频降,可下东境郡,勤课垦殖。尤弊之家,量贷麦种。”^⑦由此也产生了一些疑问:第一,南朝政府如何理解灾荒,其认识是否有所演变,这对救荒政策的制定以及麦作的推广有何影响;第二,何处是南朝稳定的麦作区,以及南朝政府为什么选择这个地区。这些都是本文将要探讨的内容。

一、南朝“东境”的范围和水旱灾害

在《宋书》所载两道“种麦诏”中,元嘉二十一年(444)“种麦诏”所划定的麦作区比较清晰,即南徐州、南兖州、南豫州和扬州的浙江以西诸郡,但大明七年(463)“种麦诏”所说“东境”应如何理解?它与前者有无关联?尽管前人曾论及此问题,却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梁纪一》“东境饥流”下注:“东境,三吴、会稽之地”,又在《梁纪十五》“东境户口空虚”下曰:“东境,谓三吴之地”^⑧。胡氏所认为的“三吴”包括吴、吴兴、义兴^⑨,则“东境”应指吴、吴兴、义兴和会稽四郡,但“东境户口空虚”下之胡注又将“东境”限于“三吴”,可见他对“东境”未必有清晰认识。黎虎认为“东境郡”是与“浙江西属郡”相对而言的,指“浙江东部,亦即扬州‘东境郡’,约当今浙江东部、江苏东南一带地区”^⑩。这似乎混淆了“浙江东”和“扬州东境”两个概念。黎虎的观点或许是受《南史·宋本

① 韩茂莉:《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61-363页。

② [唐]姚思廉:《陈书》卷三《世祖纪》,中华书局,1972年,第51页。

③ 黎虎:《东晋南朝时期北方旱田作物的南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王勇:《东晋南朝南方麦作推广的再探讨》,《西部史学》2019年第1期。

④ 黎虎:《东晋南朝时期北方旱田作物的南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⑤ 何德章:《中国经济通史》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5-446页。

⑥ [梁]沈约:《宋书》卷五《文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92页。

⑦ 《宋书》卷六《孝武帝纪》,第133页。

⑧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五《梁纪一》,中华书局,1956年,第4522页;卷一百五十九《梁纪十五》,第4930页。

⑨ 《资治通鉴》卷九十四《晋纪十六》,第2956-2957页。

⑩ 黎虎:《东晋南朝时期北方旱田作物的南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纪·孝武帝纪》“浙江东诸郡大旱”^①这一记载,以及《宋书·五行志》“元嘉十九年、二十年,东诸郡大水”条校勘记^②的影响。此外,张学锋、王勇认为大明七年诏中的东境郡指建康以东诸郡,且常常重点指会稽郡^③。因此,“东境”是一个尚存争议的地理区域概念,与之相关的还有“东诸郡”和“东土”,须加以辨析。

(一)南朝时期“东土”、“东境”和“东诸郡”所指区域

通过爬梳《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可知,“东土”出现21处,以《宋书》所载较多;“东境”出现18处,以《梁书》《陈书》所载略多;“东诸郡”出现10处,以刘宋时期居多。

《宋书》卷四十七《刘真道传》谓:

怀敬子真道,为钱唐令。元嘉十三年,东土饥,上遣扬州治中从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上表曰:“……窃见钱唐令刘真道、余杭令刘道锡……并为二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④

此时钱唐、余杭分属吴郡和吴兴郡,故二郡皆属“东土”。又《宋书》卷四十五《刘损传》云:

(刘)损,元嘉中历职义兴太守。东土残饥,太祖遣扬州治中沈演之东入赈恤,以损绥抚有方,称为良守。^⑤

《宋书》卷九十一《徐耕传》:

大明八年,东土饥旱,东海严成、东莞王道盖各以谷五百斛助官赈恤。^⑥

按,此东海、东莞应指南东海郡和南东莞郡。据《宋书·州郡志》,义兴郡原属扬州,明帝时改属南徐州,南东海、南东莞皆属南徐州^⑦。因此,“东土”当包括南徐州部分地区和义兴郡。

以上是“东土”的浙江以西部分。又《宋书》卷五十三《谢方明传》载谢方明:

转会稽太守……方明深达治体,不拘文法……东土至今称咏之。^⑧

故浙东之会稽郡亦属“东土”。至于南朝之“东境”,《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谓:

吴兴郡屡以水灾失收……中大通二年春,诏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节,发吴郡、吴兴、义兴三郡民丁就役。太子疏曰:“……所闻吴兴累年失收,民颇流移。吴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义兴去秋有稔,复非常役之民。即日东境谷稼犹贵,劫盗屡起……”^⑨

此处“东境”应指吴兴、吴、义兴等郡。又《陈书》卷三十五《陈宝应传》称侯景之乱时:

是时东境饥馑,会稽尤甚,死者十七八……而晋安独丰沃。^⑩

再如《陈书》卷十七《王劭传》谓:

太建元年,迁尚书右仆射。时东境大水,百姓饥馑,以劭为仁武将军、晋陵太守。^⑪

故“东境”还包括晋陵、会稽甚至晋安郡,其范围并不专指浙江东部。

① [唐]李延寿:《南史》卷二《宋本纪中第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67页。

② 校勘记曰:“按东诸郡,谓会稽、东阳、临海、永嘉、新安等郡”,见《宋书》卷三十三《五行四》,第975页。

③ 张学锋:《再论六朝江南的麦作业》,载胡阿祥主编:《江南社会经济研究·六朝隋唐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第294页;王勇:《东晋南朝南方麦作推广的再探讨》,《西部史学》2019年第1期。

④ 《宋书》卷四十七《刘真道传》,第1405页。

⑤ 《宋书》卷四十五《刘粹传 附刘损传》,第1385页。

⑥ 《宋书》卷九十一《孝义·徐耕传》,第2252页。

⑦ 《宋书》卷三十五《州郡一》,第1038、1041页。

⑧ 《宋书》卷五十三《谢方明传》,第1524页。

⑨ [唐]姚思廉:《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68页。

⑩ 《陈书》卷三十五《陈宝应传》,第486页。

⑪ 《陈书》卷十七《王劭传》,第239页。

如前所述,《南史·宋本纪·孝武帝纪》“浙江东诸郡大旱”之记载和《宋书·五行志》“元嘉十九年、二十年,东诸郡大水”条校勘记,易令读者将“东诸郡”理解为浙江以东诸郡。然而《宋书·沈演之传》云:“元嘉十二年,东诸郡大水,民人饥馑,吴义兴及吴郡之钱唐,升米三百。以演之及尚书祠部郎江邃并兼散骑常侍,巡行拯恤”^①,此处“东诸郡”指吴、义兴等郡。又《南齐书·高帝纪》曰:“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及东诸郡皆起兵……(太祖)率众东讨。至晋陵……晋陵太守袁粲弃城走,东境诸城相继奔散”^②,会稽、晋陵也属“东诸郡”。故“东诸郡”应是东境诸郡或东土诸郡之略称,而不单指浙东地区。检核《宋书·孝武帝纪》,言大明七年十一月“东诸郡大旱”^③,则《南史·宋本纪·孝武帝纪》所云“浙江东诸郡”或为李延寿之误会,或指东诸郡之浙江以东地区。

总而言之,“东境”与“东诸郡”“东土”相同,其范围包括吴、吴兴、义兴诸郡和南徐州部分地区,以会稽为代表的浙东地区,乃至江州之晋安郡。既不专指钱塘江以东,也并非以会稽为重点。“东境”的范围既已明晰,那么《宋书·文帝纪》和《宋书·孝武帝纪》所载两道“种麦诏”中之麦作区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重合的,即吴郡、吴兴郡、义兴郡和南徐州部分地区,此外亦可见“东境”在南朝麦作区中的重要地位。

淮河流域原是冬小麦向南推广过程中最早的植麦区^④。但宋明帝泰始二年(466)“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⑤,此后缘淮麦作区沦为边地,农业受到破坏,以至于“淮南旧田,触处极目,陂遏不修,咸成茂草”^⑥。经侯景之乱和江陵陷落后,南朝西失荆襄、北亡江淮,麦作区较前更小。另外,在有关南朝人食麦的史料中,如《宋书·郭原平传》云:“郭世道,会稽永兴人也……太祖崩,(子)原平号哭致恸,日食麦粝一枚”^⑦,又《梁书·任昉传》曰:“天监二年,出为义兴太守。在任清洁,儿妾食麦而已”^⑧,再如《陈书·张昭传》载:“张昭字德明,吴郡吴人也……及父卒,兄弟并不衣绵帛,不食盐醋,日唯食一升麦屑粥而已”^⑨,诸传主所在的会稽、义兴、吴郡皆属“东境”。所以,结合南朝数道“种麦诏”、疆域变迁形势和食麦的记载可以判断,“东境”应是南朝最稳定的麦作区。

(二)“东境”的自然灾害

《中国经济通史》第三卷和《中国灾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都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灾害做了梳理。何德章统计南朝有旱灾13次,蝗灾4次,水灾25次,绝大多数都发生在今江、浙地区^⑩。《中国灾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认为南北朝时期自然灾害的特点为:“水旱灾害是主宰,辅以其他气象灾害,间有地质灾害和生物灾害发生。”^⑪在自然灾害的空间分布上,南朝受灾较多的是今江苏和浙江两省,江苏范围内有水灾63次,旱灾29次;浙江范围内有水灾13次,旱灾2次^⑫。仅从水旱灾害的次数看,江苏受灾远较浙江严重。

若想考察南方麦作的推广和自然灾害有无关系或有何种关系,首先需要讨论麦作区的自然灾害特点。如前文所说,“东境”在南朝麦作区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以往的南北朝灾害史研究多从宏观层面进行统计,未对南朝“东境”做具体分析。故有必要梳理南朝“东境”的水旱灾害及其特点。

①《宋书》卷六十三《沈演之传》,第1685页。

②[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一《高帝上》,中华书局,1972年,第4页。

③《宋书》卷六《孝武帝纪》,第134页。

④韩茂莉:《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第360页。

⑤《宋书》卷八《明帝纪》,第160页。

⑥《南齐书》卷四十四《徐孝嗣传》,第773页。

⑦《宋书》卷九十一《孝义·郭世道传 附郭原平传》,第2243、2245页。

⑧《梁书》卷十四《任昉传》,第253页。

⑨《陈书》卷三十二《孝行·张昭传》,第430页。

⑩何德章:《中国经济通史》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35页。

⑪张美莉、刘继宪、焦培民:《中国灾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郑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⑫《中国灾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第132页。

表1 南朝“东境”的水旱灾害		
朝代	灾害史料	资料来源
宋	元嘉八年闰(六)月,扬州旱。	《宋书·文帝纪》
	元嘉十二年六月,丹阳、淮南、吴兴、义兴大水,京邑撑船。	《宋书·文帝纪》
	元嘉十三年,东土潦浸,民命棘矣。	《宋书·沈庆传》
	时三吴水淹,谷贵民饥,刺史彭城王义康使立议以救民急,亮议以:“东土灾荒,民凋谷踊,富民蓄米,日成其价……”。	《宋书·自序·沈亮传》
	元嘉十九年、二十年,东诸郡大水。	《宋书·五行志》
	孝建二年八月,三吴民饥,癸酉,诏所在赈贷。	《宋书·孝武帝纪》
	大明元年五月,吴兴、义兴大水,民饥。乙卯,遣使开仓赈恤。	《宋书·孝武帝纪》
	大明五年四月戊戌,诏曰:“南徐、兖二州去岁水潦伤年,民多困窶。逋租未入者,可申至秋登。”	《宋书·孝武帝纪》
	大明七年九月己卯,诏曰:“近炎精亢序,苗稼多伤。今二麦未晚,甘泽频降,可下东境郡,勤课垦殖。尤弊之家,量贷麦种。”	《宋书·孝武帝纪》
	大明七年十一月,东诸郡大旱,开仓贷恤。	《宋书·孝武帝纪》
	大明八年,时东土大旱,都邑米贵,一斗将百钱。	《宋书·孔觐传》
	升明三年四月乙亥,吴郡桐庐县暴风雷电,扬砂折木,水平地二丈,流漂居民。	《宋书·五行志》
齐	建元元年九月辛丑,诏“二吴、义兴三郡遭水,减今年田租”。	《南齐书·高帝下》
	建元四年六月戊戌,诏曰:“水潦为患,星纬乖序……吴兴、义兴遭水县,蠲除租调。”	《南齐书·武帝纪》
	永明三年,大鸟集会稽上虞。其年,县大水。	《南齐书·五行志》
	永明五年八月乙亥,诏“今夏雨水,吴兴、义兴二郡田农多伤,详蠲租调”。	《南齐书·武帝纪》
	永明六年八月乙卯,诏“吴兴、义兴水潦,被水之乡,赐痼疾笃瘡口二斛,老(落)[疾]一斛,小口五斗”。	《南齐书·武帝纪》
	永明八年冬十月丁丑,诏“吴兴水淹过度,开所在仓赈赐”。	《南齐书·武帝纪》
梁	建武二年冬,吴、晋陵二郡水雨伤稼。	《南齐书·五行志》
	吴兴郡屡以水灾失收……中大通二年春,诏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节,发吴郡、吴兴、义兴三郡民丁就役。	《梁书·昭明太子传》
陈	永定三年夏闰四月庚寅诏:“……吴州、缙州去岁蝗旱”。	《陈书·高祖下》
	太建元年,迁尚书右仆射。时东境大水,百姓饥谨,以劬为仁武将军、晋陵太守。	《陈书·王劬传》

从表1可知,“东境”水灾较多而旱灾较少,严重的旱灾见于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八年,另外,水灾多发于夏秋季节,尤以吴郡、吴兴郡、义兴郡及晋陵郡等环太湖诸郡最为频繁。如韩茂莉所说,南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着水田独立耕作、一年一熟的种植制度,持续到宋代,才构成以水稻为核心的复种制度^①。由于水稻是南朝“东境”的传统农作物,在一年一熟的种植制度下,江南采取直播形式种植水稻,水稻收获期在秋季末^②,所以,水旱灾害在短期内对“东境”造成的最直接影响是水稻减产甚至绝收以及饥荒^③。邓云特将中国历代救荒思想分为攘诐论、消极救济论和积极预防论,又将历代救荒政策分为巫术救荒、消极救荒政策和积极救荒政策^④。另外也有不少论著从政府与民间两个层面探讨古代救荒措施。

① 韩茂莉:《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第433页。
② 同上。
③ 亦可参看张学锋:《再论六朝江南的麦作业》,第291-293页。
④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61-220页、223-397页。

我们在此或可将南朝政府督“东境”民种麦,视为由官方主导的具有积极预防作用的救荒政策。

不过,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南朝普通百姓的存粮十分有限,“在所贫罄,家无宿积……岁或不稔,而病乏比室”^①,政府督种之麦需经八九个月至次年夏季方能收获,这段时间差考验着灾民求生和政府救灾的能力。如大明七年(463)“东境”旱灾,九月孝武帝诏令东境民种麦,但仍有大量灾民逃至建康求食,以至于大明八年二月孝武帝命令都城开仓救济^②。对“东境”受灾群众而言,即使种麦在未来具备一定的救饥意义,但政府开仓赈济、调粮、蠲免等看似消极治标的政策才是短期内最积极的救荒措施。那么,南朝政府对其境内灾荒和灾民又有怎样的体认?通过梳理这一问题,我们也许能尝试从救荒史框架里的“消极”与“积极”政策对立中走出来,对南方麦作之推广有更多的了解。

二、南朝政府对灾荒的认识

坐食于建康的君主和中央官员如何认识灾荒,这将影响南朝政府的救灾与救荒政策,也同受灾百姓的生命安全密切相关,并牵涉南方麦作得以推广的原因和麦作区的选择等诸多问题。

元嘉八年闰(六)月庚子诏:

自顷农桑惰业,游食者众,荒莱不辟,督课无闻。一时水旱,便有罄匮,苟不深存务本,丰给靡因。郡守赋政方畿,县宰亲民之主,宜思奖训,导以良规。咸使肆力,地无遗利,耕蚕树艺,各尽其力。^③

宋文帝此时认为“一时水旱,便有罄匮”的原因是农民惰业游食、不辟荒莱,因此要求地方守宰奖励并引导百姓,积极开展耕垦。至元嘉二十年(443)时,文帝的态度并未转变,如此年十二月壬午诏曰:

自顷在所贫罄,家无宿积。赋役暂偏,则人怀愁垫;岁或不稔,而病乏比室。诚由政德弗孚,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广,地利多遗。宰守微化导之方,萌庶忘勤分之义。永言弘济,明发载怀。虽制令亟下,终莫惩劝,而坐望滋殖,庸可致乎。有司其班宣旧条,务尽敦课。游食之徒,咸令附业,考核勤惰,行其诛赏,观察能殿,严加黜陟。^④

虽然文帝对农民储粮匮乏之情况有所了解,也指出了赋役方面存在的问题,但还是严厉斥责“萌庶”和地方守宰,并将灾后饥荒归因为:1.耕桑未广;2.地方官劝课不力;3.百姓游食懒惰。下发的诏令中制定了既针对地方官也针对游民的解决办法。由此可见,此时的文帝政府对灾荒问题有一种“别样”的理解:模糊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和饥荒之间的关系,唯突出农业生产之重要性。在生产力落后的时期,重农理论固然备受推崇,重农政策亦有深厚的历史基础^⑤,但在对灾害和作物生长特点以及粮食生产结构之间的关系缺乏认知时,强令游民附业和鼓励垦植等重农措施实难见效,有时只会适得其反。

至元嘉二十一年(444)时,文帝对灾荒的理解更加深入,七月乙巳诏曰:

比年谷稼伤损,淫亢成灾,亦由播殖之宜,尚有未尽。南徐、兖、豫及扬州浙江西属郡,自今悉督种麦,以助阙乏。速运彭城下邳郡见种,委刺史贷给。徐、豫土多稻田,而民间专务陆作,可符二镇,履行旧陂,相率修立,并课垦辟,使及来年。凡诸州郡,皆令尽勤地利,劝导播殖,蚕桑麻纴,各尽其方,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⑥

①《宋书》卷五《文帝纪》,第91页。

②《宋书》卷六《孝武帝纪》,第133、134页。

③《宋书》卷五《文帝纪》,第80页。

④《宋书》卷五《文帝纪》,第91页。

⑤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第202-206、338-356页。

⑥《宋书》卷五《文帝纪》,第92页。

元嘉二十一年之前,文帝似乎并未认清灾害特点和粮食生产结构的缺陷,仅强调游民附业、增垦土地和扩展耕桑。元嘉二十一年诏本质上仍为劝课农桑,但指出了连年灾害对谷稼生长的破坏性,更承认“播殖之宜,尚有未尽”,故而督民种麦。这与元嘉八年和元嘉二十年的认识相比,显然不同。

宋文帝之后的南朝政府虽然也一直强调灾后劝课,不过对灾荒成因及影响的认知较为客观。宋孝武帝大明七年(463)九月己卯诏:“近炎精亢序,苗稼多伤。今二麦未晚,甘泽频降,可下东境郡,勤课垦殖。尤弊之家,量贷麦种。”^①孝武帝诏意识到麦作对接续粮食生产与补充粮食供给的作用,且并未申斥百姓懒惰和地方官员失职。又如梁武帝大同十年(544)九月己丑诏云:“田者荒废、水旱不作、无当时文列,应追税者,并作田不登公格者,并停。各备台州以文最逋殿,罪悉从原。其有因饥逐食,离乡去土,悉听复业,蠲课五年。”^②与宋文帝相比,梁武帝在此明确了水旱灾害与农业生产、饥荒和流民之间的关系。

前引元嘉三诏,反映出南朝官方对粮食储备和供给现状有一种隐隐的担忧,如“一时水旱,便有罄匮,苟不深存务本,丰给靡因”。再如《宋书·二凶传·刘濬传》载刘濬任扬州刺史时,“明年(元嘉二十二年),濬上言:‘所统吴兴郡……彼邦奥区,地沃民阜,一岁称稔,则穰被京城,时或水潦,则数郡为灾。顷年以来,俭多丰寡,虽赈赉周给,倾耗国储,公私之弊,方在未已’”^③,刘濬认为吴兴等“东境”地区受灾后,“赈赉周给,倾耗国储”。一方面,“东境”频遭水灾,影响水稻生长和收获;另一方面,政府开仓救灾,又会不断消耗“国储”,公私都将受到危害。由此可见,南朝官方面对“东境”灾荒,是要首先保障京城粮食供应和国储的丰足,以避免粮食供给系统的垮塌。

要言之,南朝官方对灾荒的认识并非始终如一。宋文帝曾以灾民为窃贼、以守宰为寇仇,将造成饥荒的责任推卸给萌庶与地方官员;至元嘉二十一年始发觉粮食生产结构的不足和自然灾害的特点,从而在“东晋”等地督民种麦,此种政策为之后的南朝政府所继承。另外,南朝政府被“东境”频繁的自然灾害所引起的救荒和粮储问题所困扰,逐渐意识到开仓、调粮等办法的局限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才有可能发现南朝时期东境麦作在推广过程中具有更丰富的面貌。

三、“东境”与南朝东部粮食供给系统

“东境”屡屡受灾,使南朝政府面临一对矛盾:短期内“东境”水稻减产甚至绝收并导致人员伤亡,要求政府动用粮食储备或跨区调粮;而从稍长时段看,“东境”灾害对粮食供给体系造成冲击,亦即刘濬所说的“赈赉周给,倾耗国储,公私之弊,方在未已”。若粮食消耗量长期大于补给量,此供给系统终将难以维持。可是,“东境”所在的粮食供给系统关乎南朝的国家安全,宋齐梁陈无不致力于对它的掌控。

(一)“东境”与“建康”及缘淮地区之间的粮食供给

中村圭尔^④、刘淑芬^⑤和权家玉^⑥等学者都曾分析过吴会地区和建康之间的关系。简言之,吴会地区是南朝的经济命脉,与朝廷的贡赋收入和建康的繁荣紧密相连。

刘淑芬和权家玉还提及吴会运往建康的粮食供应问题。刘教授指出:“吴会为‘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的主要粮米产区,建康众多的官吏、家口、商人、军人皆仰赖此区的粮食供应,三吴的漕运便成为建康的生命线。”^⑦权家玉在此基础上,专门考察了东晋南朝境内的仓储分布,他认为:“扬州区域作为经济重

①《宋书》卷六《孝武帝纪》,第133页。

②《梁书》卷三《武帝下》,第89页。

③《宋书》卷九十九《二凶·刘濬传》,第2435页。

④中村圭尔:《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第六章《建康と三吳地方》、第七章《六朝時期會稽郡の歴史的役割》,汲古書院,2006年,第222-267页。

⑤刘淑芬:《六朝建康的经济基础》,《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增订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66-88页。

⑥权家玉:《地域性与南朝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65-155页。

⑦刘淑芬:《六朝建康的经济基础》,第68页。

心,可考之政权直辖仓库九处,七处居于扬州,建康则占其五”^①。粮仓的分布间接说明南朝时期“东境”的绝大多数粮食流入建康,百姓“在所贫罄,家无宿积”未必是夸张之辞。正因如此,“东境”受灾后,众多百姓逃至都城求食。《宋书·孝武帝纪》载大明八年(464)二月壬寅诏曰:“去岁东境偏旱,田亩失收。使命来者,多至乏绝。或下穷流冗,顿伏街巷,朕甚闵之。可出仓米付建康、秣陵二县,随宜贍恤。若济拯不时,以至捐弃者,严加纠劾。”^②来自“东境”的大量“下穷流冗”涌入京邑二县,迫使孝武帝不得不打开建康粮仓以施行救济。可见“东境”受灾,不仅破坏了原有的东境与建康间的粮食供给系统,而且还消耗国储,甚至影响京邑社会的稳定。梁陈之际,兵燹不休,南朝疆土大蹙,《陈书·沈君理传》云:“(陈)高祖受禅……(沈君理)出为吴郡太守。是时兵革未宁,百姓荒弊,军国之用,咸资东境”^③,此时“东境”之粮对都城而言尤显珍贵。所以,保障“东境”对建康的粮食供给是南朝政府的长期任务。

另外,淮河流域与“东境”也有着密切的粮食供给关系。《宋书·自序·沈亮传》云:

时三吴水淹,谷贵民饥,刺史彭城王义康使立议以救民急,亮议以:“东土灾荒,民凋谷踊,富民蓄米,日成其价……又缘淮岁丰,邑富地穰,麦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析其估赋,仍就交市,三吴饥民,即以贷给,使强壮转运,以贍老弱……”。^④

沈亮注意到其时“东境”遭水而缘淮地区丰收,故提议用淮粮供给东土。正因缘淮地区多种植麦粟等旱地作物,宋文帝在江南推广麦作时,诏令“自今悉督种麦,以助阙乏。速运彭城下邳郡见种,委刺史贷给”^⑤,此亦以淮粮补给“东境”之例。淮河流域有时亦须“东境”供给粮食,《宋书·文帝纪》载元嘉十七年:

八月,徐、兖、青、冀四州大水,己未,遣使检行赈恤。

(十一月)丁亥,诏曰:“前所给扬、南徐二州百姓田粮种子,兖、两豫、青、徐诸州比年所宽租谷应督入者,悉除半……”。^⑥

将“前所给扬、南徐二州百姓田粮种子”除半,当是用于赈恤徐州等遭水诸州。宋明帝以后,淮河流域沦为边地,原有的农业生产多废毁停滞。齐武帝时,“江淮之间,仓廩既虚,遂草窃充斥,互相侵夺,依阻山湖,成此逋逃”^⑦,故缘淮地区更加依赖江南的粮食供给。如《南齐书·徐孝嗣传》载齐明帝时徐孝嗣所上《屯田表》:

窃寻缘淮诸镇,皆取给京师,费引既殷,漕运艰涩。聚粮待敌,每(若)[苦]不周,利害之基,莫此为急。臣比访之故老及经彼宰守,淮南旧田,触处极目,陂谿不修,咸成茂草。平原陆地,弥望尤多。今边备既严,戍卒增众,远资馈运,近废良畴,士多饥色,可为嗟叹……若缘边足食,则江南自丰,权其所饶,略不可计。^⑧

此时“缘淮诸镇,皆取给京师”,京师之粮又多来自“东境”。所以,徐孝嗣提议缘边地区开展屯田,种植菽麦,以减轻江南的粮食供给压力。总之,在宋明帝泰始二年(466)失去淮北、淮西之前,“东境”与缘淮地区间乃粮食互济关系,此后至侯景之乱,大抵由“东境”为缘淮地区单向供给粮食。

至于“东境”与长江中上游地区之间的粮食供给情况,虽缺乏具体记载,但《宋书·孔觐传》称大明八年“(孔觐)徙司徒左长史,(孔)道存代觐为后军长史、江夏内史。时东土大旱,都邑米贵,一斗将百钱。道存虑觐甚乏,遣吏载五百斛米餉之……吏曰:‘自古以来,无有载米上水者,都下米贵,乞于此货之。’

① 权家玉:《地域性与南朝政局》,第103-104页。

② 《宋书》卷六《孝武帝纪》,第134页。

③ 《陈书》卷二十三《沈君理传》,第299页。

④ 《宋书》卷一百《自序·沈亮传》,第2449-2450页。

⑤ 《宋书》卷五《文帝纪》,第92页。

⑥ 《宋书》卷五《文帝纪》,第87页。

⑦ 《南齐书》卷三《武帝纪》,第61页。

⑧ 《南齐书》卷四十四《徐孝嗣传》,第773-774页。

(孔觐)不听,吏乃载米而去。”^①江夏吏所言“自古以来,无有载米上水者”,表明当时“东境”之粮一般不会运往长江中上游。另外,有学者指出,荆州赋税大部分用于支持当地军府^②,江、湘二州之物资则主要支持上游和北面军镇,交、广、宁、益诸州的财税往往以卸任都督刺史之“还资”携回建康^③。因此,“东境”与这些地区之间的粮食供给关系应较为薄弱且不稳定。

(二)南朝“东境”治水工程之失败

前引《宋书·刘濬传》已透露出南朝政府对赈灾所引发的“倾耗国储”之隐忧,为此南朝政府和百姓探索过缓解“东境”灾害从而维护“东境”粮食供给稳定的根本措施。《刘濬传》载:

州民姚峤比通便宜,以为二吴、晋陵、义兴四郡,同注太湖,而松江沪渎壅噎不利,故处处涌溢,浸渍成灾。欲从武康纒溪开漕谷湖,直出海口,一百余里,穿渠浚必无阂滞。自去践行量度,二十许载。去十一年大水,已诣前刺史臣义康欲陈此计,即遣主簿盛昱泰随峤周行,互生疑难,议遂寢息。^④

在宋文帝前期,已经有人指出太湖缺少有效的外泄通道是造成“东境”水灾的重要原因,并向扬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建议,但终未能施行。刘濬任扬州刺史时,于元嘉二十二年(445)重提旧议,勘察地势,欲开漕排水:

既事关大利,宜加研尽,登遣议曹从事史虞长孙与吴兴太守孔山士同共履行,准望地势,格评高下,其川源由历,莫不践校,图画形便,详加算考,如所较量,决谓可立。寻四郡同患,非独吴兴,若此浚获通,列邦蒙益……今欲且开小漕,观试流势,辄差乌程、武康、东迁三县近民,即时营作。若宜更增广,寻更列言。^⑤

尽管此建议获得文帝同意,但最终“功竟不立”。这或许是因为工程难度大,其中还涉及复杂的社会问题。梁武帝时又有人谏言开漕将湖水泻入钱塘江,《梁书·昭明太子传》云:

吴兴郡屡以水灾失收,有上言当漕大渎以泻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诏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节,发吴郡、吴兴、义兴三郡民丁就役。太子上疏曰:“伏闻当发王弁等上东三郡民丁,开漕沟渠,导泄震泽,使吴兴一境,无复水灾……即日东境谷稼犹贵,劫盗屡起,在所有司,不皆闻奏。今征戍未归,强丁疏少,此虽小举,窃恐难合,吏一呼门,动为民蠹。又出丁之处,远近不一,比得齐集,已妨蚕农。去年称为丰岁,公私未能足食;如复今兹失业,虑恐为弊更深。且草窃多伺候民间虚实,若善人从役,则抄盗弥增,吴兴未受其益,内地已罹其弊。不审可得权停此功,待优实以不……”。高祖优诏以喻焉。^⑥

萧统深悉“东境”社会存在的诸多困难,“东境”民丁已承担了向都城输租和征戍的义务,若再使其服开漕沟渠之役,将会妨碍农业生产,并引发社会治安问题,所以他上疏试图劝阻开漕工程。结合表1中陈宣帝太建元年(569)“东境大水”可知,梁武帝中大通二年(530)开漕最终也未达到“无复水灾”的预期效果。因此,开漕泄水工程在南朝难以真正落实并解决“东境”水患,无法保障传统的水稻生产安全,继而维持“东境”向建康和缘淮地区的粮食供给。

综上所述,“东境”、建康和缘淮地区共同构成了南朝的东部粮食供给系统,“东境”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始终关系着“军国之用”。虽然南朝政府曾实行开仓赈赡和淮粮南运等措施,企图缓解“东境”灾荒,又尝试通过水利工程从根本上改善“东境”的水环境,最终恢复并稳固“东境”的粮食生产及供给,却

①《宋书》卷八十四《孔觐传》,第2155-2156页。

②刘淑芬:《六朝建康的经济基础》,第67页。

③权家玉:《地域性与南朝政局》,第72-77页。

④《宋书》卷九十九《二凶·刘濬传》,第2435页。

⑤《宋书》卷九十九《二凶·刘濬传》,第2435-2436页。

⑥《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第168-169页。

终究不能长久。在此背景下,对南朝政府而言,诏令“东境”等地区推广麦作乃是减少国储倾耗并维持粮食供给系统运转的更好选择。前引陈文帝诏所谓“麦之为用,要切斯甚”,或可视为基于“东境”灾荒频发、国储缩减、水利工程失败之总体形势而得出的结论。

陈宣帝太建九年(577)五月丙子诏曰:“可起太建以来讫八年流移叛户所带租调……六年七年通租田米粟夏调绵绢丝布麦等”^①,其中将麦纳入夏调。张学锋同意中华书局标点本《陈书》校勘记的意见,认为此处“麦”当作“帛”,“麦作为夏调中的一项,既与丁调的内容不符,也与当时麦作业发展的实际水平不符”。^②张荣强则持异议:“南朝有‘三调’、‘税调’之语,这里的‘调’,泛指赋税,并非单指绢布之类……《册府元龟》误改‘帛’,恐是后人不懂南朝制度所致”。^③另外,南朝所推广之麦应为冬小麦^④,于当年秋季播种,次年夏季收获,亦正符合“夏调”之要求。又《陈书·孔奂传》载梁末陈霸先与北齐军决战之前,命建康令孔奂“多营麦饭,以荷叶裹之,一宿之间,得数万裹”^⑤,《南史·陈本纪·武帝纪》则记作:“是时食尽,调市人馈军,皆是麦屑为饭,以荷叶裹而分给,间以麦饼”^⑥,可见萧梁时已有大量的麦流入建康市。麦之融入南朝粮食供给系统,与其是否已经十分普及以及种植技术是否大幅提升似无必然联系,而是南朝维持军国之需的一大要求。太建五年北伐后,至太建十一年,陈朝虽曾暂时控制淮南和部分淮北地区,但主要实行绥抚给复政策,如太建六年(574)十一月乙亥诏称:“北讨行军之所,并给复十年”^⑦,那么夏调输麦的地区当仍以“东境”为主而不包括缘淮地区。此外,如前所述,南朝时期“东境”人多有食麦之经历,建康百姓乃至皇室亦偶啖麦食。所以,“东境”之麦已成为南朝东部粮食供给系统中的重要内容。

结 语

南朝政府对灾荒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之前,并未清楚觉察到粮食生产结构之缺陷和自然灾害之特点,而将灾荒归咎于百姓和守宰;元嘉二十一年后,南朝政府转变态度,并数次通过诏令在“东境”等地区推广麦作。建康建有五座粮仓,广为吸纳“东境”所产之粮,因此受灾百姓自家存粮极少。受灾之后,他们却被诬以造成饥荒之罪名,“东境”民众在灾荒中的弱势地位昭然可见。客观地说,即使种麦可以起到一定的救饥作用,但受灾百姓短期内最寄予希望的恐怕仍是政府开仓和调粮。

与受灾百姓的诉求不同的是,南朝官方注意到“东境”频频受灾后,开仓与调粮会威胁国储。“东境”在南朝的东部粮食供给系统中地位独特,是建康和缘淮地区之粮仓,军国之用多出于此,并且随着淮河流域麦作区因战乱而逐渐委顿,南朝政府的粮食供给压力陡增。面对“东境”的频繁灾荒,官方主导的调粮和水利工程措施都未能持续见效,于是为免国储倾耗,在“东境”等地推广麦作成为一种折中、长期、可实行的、一举多得的方案,这既具有移民、地貌等便利条件,又与“东境”的自然灾害特点相合,有助于补足受破坏的粮食生产工作,避免灾荒扩大,以及维持东部粮食供给系统的持续运转。故终南朝之世,“东境”应为南方最稳定且核心的麦作区,“东境”之麦也的确在粮食供给系统中发挥了作用。

[本文承蒙段伟教授指点;另得到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胡文亮)

①《陈书》卷五《宣帝纪》,第90-91页。

② 张学锋:《再论六朝江南的麦作业》,第304页。

③ 张荣强:《从计断九月到岁终为断——汉唐间财政年度的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④ 韩茂莉:《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第319-323、359-364页。

⑤《陈书》卷二十一《孔奂传》,第284页。

⑥《南史》卷九《陈本纪上第九》,第263页。

⑦《陈书》卷五《宣帝纪》,第87页。